



BOYA HUAREN BENTU XINLIXUE CONGSH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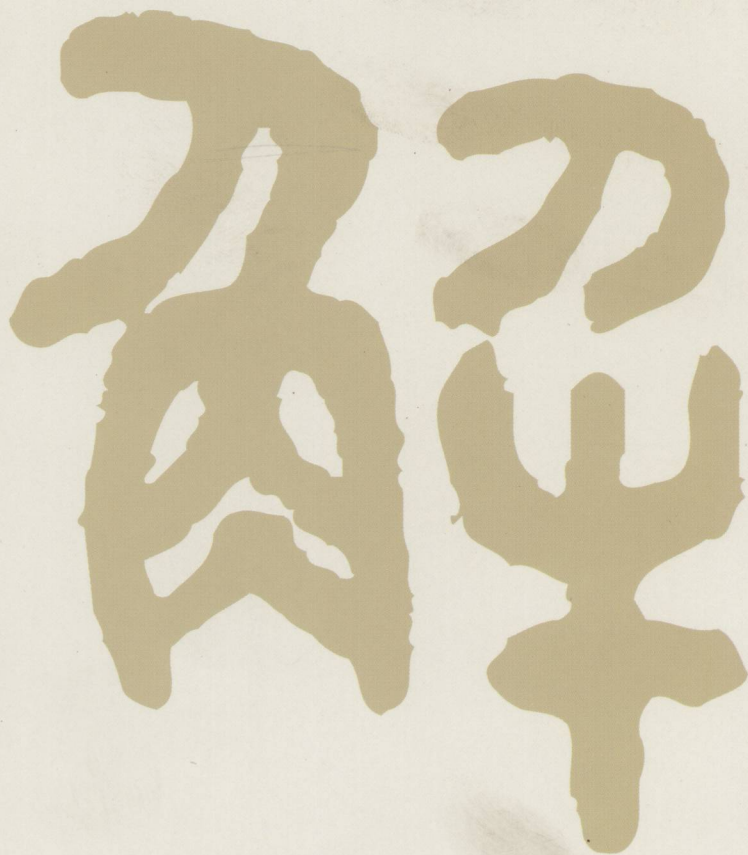
博 雅 华 人 本 土 心 理 学 丛 书

如何理解中国人

文化与个人论文集

RUHE LIJIE ZHONGGUOREN
WENHUA YU GEREN LUNWENJI

■ 杨中芳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BOYA HUAREN BENTU XINLIXUE CONGSHU

博 雅 华 人 本 土 心 理 学 丛 书

如何理解中国人

文化与个人论文集

RUHE LIJIE ZHONGGUOREN
WENHUA YU GEREN LUNWENJI

■ 杨中芳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何理解中国人:文化与个人论文集/杨中芳著. —重
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9
(博雅华人本土心理学丛书)
ISBN 978-7-5624-4933-1

I. 如… II. 杨… III. 民族心理学—中国—文集 IV.
C95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3225 号

如何理解中国人

文化与个人论文集

杨中芳 著

责任编辑:夏宇 版式设计:王斌

责任校对:郭小梅 责任印制:赵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张鸽盛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A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东南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30.5 字数:489千 插页:16开2页

2009年10月第1版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978-7-5624-4933-1 定价:59.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简体字版序

这本书的繁体版本出版于2001年,在其第七章的后记中,我曾引述了一段登刊在南方周末报上的专访。受访者为当代知名台湾作家龙应台,她与记者的对话题目是:21世纪会是华人的世纪吗?我们要怎么做,才能让21世纪成为华人的世纪?这两个问题固然提得“霸气十足”,让我很忧心,但是它们在21世纪之初,也不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议题。只不过我们可以将之“实事求是”地改为:我们要如何做才能让21世纪听到华人的声音?

该报负责这篇专访的记者感慨地指出,不少西方汉学家试图通过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来寻找解决自身文化困境的钥匙。然而,我们自己却身陷西方文化及文明的糖浆之中不能自拔。他在文中追问,我们要如何做才能让21世纪成为华人的世纪。龙应台响应,我们要彻底地深入理解自己的文化,才有办法在传统文化中找到现代的语言,找到与全球化的衔接点。

我之所以在本书中引述该文是因为该报记者的感慨,在当代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圈子里看得最清楚,中国本地学者对西方的哲学、文学、历史、社会、政治了如指掌,视西方的科学研究及理论为圣经宝典,时不时拿出西方学者的理论及研究成果,来对自己评头论足。因此在社会科学领域,听不到本地学者自己的声音,听到的只是外来的回音。

但是,作为自己文化传承的一份子,作为研究中国人的本地社会科学家,难道他们不知道自己研究的对象是中国人——生长在一个特定文化/社会/历史环境下的中国人吗?如果知道,那么,他们到底对自己生长及生活的传统文化知道多少?他们又有没有想过要如何把中国的文化传统与自己所研究的对象——生活在当代的中国人联系起来?从而,才能像龙应

台所说的那样,用现代的语言把中国文化给说清楚、讲明白?与全球化衔接起来?最终,才能让21世纪真的成为有中国人声音的世纪?

从事本土心理学的工作者,在过去这二十多年来,就是在想回答以上提出的这些问题。本书接续我的前一本书——《如何研究中国人》,记录了我和一些我志同道合的伙伴们,在采用本土研究进路来探研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时,所走过的心路历程。在《如何研究中国人》一书中,我们主要是道出,沿用西方主流心理学的理论及研究方法之不足,唤起大家要有“自力更生”的勇气,让自己的学问真能反映及描述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及问题,而不是带着主流心理学的框架,来“削足适履”。

在本书中,我则主要是围绕着要如何来认识及理解中国人,才能真实地反映及描述当代中国人的心理及行为这一主题进行探讨。全书分为五个部分:(1)阐述西方心理学知识背后的文化/社会/历史根源,指出要依据自身的根源,来理解自己的必要性;(2)讨论“文化/社会”要如何与“个体”联系,才能用于理解在中国这个文化环境中长大的人;(3)讨论“传统/现代”要如何与“个体”联系,才能理解背负了历史,及面对全球化浪潮的现代中国人;(4)给出一些可以用之来理解中国人的文化释义系统;(5)运用这一整套的系统,来重新理解中国人的生活现象。

我自己的看法是,唯有当我们用本土的释义系统来理解了中国人,我们才能找到中国文化在新世纪的定位,以及它可能作出贡献,从而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

为了让读者能更形象地看到本书中所讨论问题的关键性,我在繁体字版出版之时,决定用我自己在研究“中国人的自我”时所遭遇的困惑及所走的弯路,写成一篇“代序”,希望我的经验能带领读者更快地进入本土进路的思维之中。

自从本书繁体字版本出版至今,八年已经过去了,中国的国力果然强大了起来,全世界的眼光也确实都集中到中国人的身上,21世纪成为华人的世纪已经由假想快变成可能了。然而,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难道我们能给全世界的就只是奥运、世博、高速公路及铁路吗?

清华大学阎明通教授于2009年6月22—23日在北京开的一个名为“现代中国情境中的传统价值观:多学科的解读与构建研讨会”上曾指出,当全世界的眼光都集中在中国,在我们不断地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的同时,如果自己却不断地在唾弃及遗忘自己的传统文化,那么我们还

能给这个世界看什么、教什么呢？

看来，采用本土进路来研究中国人，终于等到它出头的一天了，本书中所探讨的问题也没有过时。因为它正是在寻找如何在其自身的文化/社会/历史脉络中来理解当代中国人。为此，我非常感谢重庆大学出版社认识到这一点，承接了这一简体字版问世的工作。

本书是一本写给从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及研究生看的参考书。抱的雄心壮志是：要让研究中国人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不要整天跟随西方现有社会科学的理论及研究热点打转，而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让自己的研究成果能为普世的社会科学作出贡献。

这条路是艰难的，但也是我们必须去探试的，才能让 21 世纪听到中国人的声音。

杨中芳

2009 年 8 月 10 日于台北

我的“自我”探索^①：

一个本土研究者的自述

代序

最近有一个机会整理了自己过去十年有余所做过的,与“自我”有关的研究。发现对“中国人的自我”之探索,与自己“学术自我”的追寻及成长,是密不可分的。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除了累积了许多要如何研究“中国人的自我”的经验及想法之外,也对自己在“要做什么样的学问”这个问题上,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及肯定。我想,也许在这两方面的这些经历,对其他朋友,特别是青年的、刚入此行的同事,会有一点参考的价值。所以选择了这一题目为今日讲演之主题。它一方面,是我对“中国人的自我”一课题的探索;另一方面,也是我自己学术生涯的一个人的自传。

对“中国人的自我”的研究兴趣,起源于决定要以本土研究进路,来重新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其实,那时我对本土心理研究到底应该是什么、要怎么去做,仍然没有什么概念。只是模模糊糊地觉得,不能老是闭着眼跟着外国学者走,必须睁开眼看看自己生活的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在对“自我”这一课题的探索过程中,才逐渐对本土研究进路应该是怎么样来做研究,形成了比较清晰、明确的图像。反之,也正是在对要怎么去做本土研究的探索过程中,我对“中国人的自我”要研究什么,以及要如何研究,逐渐有了比较成形的想法及做法。所以说,自己的学术成长,是在对“中国人的自我”及“本土研究”两项之探索的相互刺激下,逐渐发展出来的。

在这个辩证过程中,自己的学术兴趣性向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也看到了自己的文化及过去的经历,如何引导和限制了我的学术发展。也知道了

① 本文初稿是应台湾“中国心理学会”1997年度年会的邀请,于9月21日在大会发表专题演讲之讲稿。会后曾经修改部分内容,发表于《本土心理学研究》,11期,页265-284。

自己大致可以做到什么、不可以做到什么。在对自己的研究方向及自己有了这样的了解之后,我最近又重新展开新一轮“中国人的自我”的探索,并有了一些新的进展,在这里向大家报告一下。

1984年当我在经历了十年的“自我放逐”,再回到心理学系来教书时,我已经经过了70年代由Gergen等人,在美国所引发的“社会心理学危机”的洗礼(Gergen, 1973)。也接触了一些以中国人为受试的研究文献,对当时“中国化”的提法,形成了初步的认同。因此,决定寻找一个新的研究进路,来做一些自认为是更符合于中国人的状况,以及会对中国人更有用的研究。这想法当然是够天真,不过却反映了中国读书人最终的抱负,总不把兴趣完全放在做学问本身,好像老有一个更大的使命在等待着我们去承担。当时,我已经知道走这条道是艰难的、冒险的、可能是一事无成的。然而,这些心理准备,现在回想起来,都还远远不够。不过,至少都被证实是必要的,值得有志者为之三思而后“不”行的。对我这个具有赌博性格、喜欢新鲜的人而言,这些挑战正是吸引我再回到心理学系的原因。

好了,在决定要寻找新的研究进路来研究中国人的心理活动之后,我立刻面临了三个重要的问题:

一、从什么地方开始

在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危机中,最突出的一个发现就是,研究题目及研究思路的选择,受到研究者本身的背景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巨大。这一点让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研究结果,不能在中国的大学讲堂只用美国的教科书,只讲美国人的社会心理规律,以及必须发展中国人自己的社会心理学的原动力。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华人终究是人,中国人、美国人都是人,人在其人种进化及社会进化的过程中,必定有其共通的地方。要研究中国人的心理就必须找到一个研究点,这个点是文化开始产生影响,使中国人不同于美国人或其他人的地方。在这一点上,我选择了“自我”的研究。

早期人类学家认为,人类对自我的意识及反省能力是其能使用工具及语言来生活运作的先决条件。说明了个体本身的心理历程,是决定其社会环境的原动力。但是,后期文化人类学家则强调,各个文化对“人”到底是

什么,以及“人”与其周遭环境之关系的构想,是决定在其中生活的人要怎么看自己、要做什么、要变成什么样子、要如何评价自己、要如何表现自己及如何与别人交往的主要蓝本。这些研究成果似乎指出,“自我”是一个可以集文化与个体于一体的构念,也是反映文化与个体相互影响的指标。既然研究中国人心理是要研究在中国文化中生活的人的心理,那么研究“自我”应该是很关键的。于是我决定从这个概念开始。

有了这样一个决定后,我开始着手搜索有关中国人的自我的研究文献。发现大家几乎千遍一律地采用西方文献的研究构念及研究工具。而用这些研究工具所得到的结果通常均显示,当与白种西方人的结果相比较,中国人的自尊很低、内控感知低、外控感知高、焦虑高、神经质高、精神质高,林林总总,不胜枚举(杨中芳,1991a)。

在知道了这些结果之后,除了我的自尊变得非常低之外,最让我焦虑及神经质的是:中国受试在西方量表中的测谎题上的得分很高。这一点,除了可能反映中国人爱说谎之外,也可能反映中国受试的社会赞许需求高。这样,中国人在问卷上所给予的答案,可能都只测量一个构念。那就是,受试之社会赞许需求!这样一来,让我感觉要真正研究中国人的自我,或任何其他心理,恐怕必须先搞清楚的是:中国人在研究情境中,到底会怎么样做?他们表现的“我”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我?这促使我选择先研究中国受试的作答行为,作为我开始探索中国人的自我的第一步。

1. 受试在研究情境所表现的自我是什么

当时我首先考虑,中国人在测谎题上所得的高分,到底是反映中国人真的爱说谎,还是一个由于研究工具的非本土性所造成的假象?由于测谎题中多用“我偶而吐痰”之类的句子,我当时想,也许,中国语言中对像“偶而”这样的频率副词之留意程度,与外国文字不同,以致造成中国受试只注意到“吐痰”而忽略了“偶而”,因而比较容易否定这个句子,从而导致在测谎题上分数很高(杨中芳,赵志裕,1990)。

也可能,中国受试对自己“君子”形象的关注,让他们不肯承认自己有缺点,是造成他们在测谎题上得分高的原因。另外,我也考虑到,西方测谎题既然是测社会赞许的,那么,它必定是用被西方人认为是赞许的或不赞许的行为,来编制测题。但是那些在西方文化中,被认为是赞许或不赞许的行为,是否一定是在中国文化中,也被赞许或不赞许的呢?即使它们也

是同样被赞许或不被赞许的,但它们对中国人而言,有没有重要到要在问卷上以答“是”或“否”的行动,来表现其符合社会要求的地步呢?显然,要了解中国受试在研究情境所表现的“自我”,我们非要尝试自制一个新的本土社会赞许量表才行。

2. 中国人如何作自我评价

接着,我又想看看,为什么中国人在自尊量表上得分那么低?我提出了,会不会是“谦虚”使中国受试在自尊量表上得分低的假设。也试图探索在“不赞己长”及永远要“克服缺点”的文化熏陶下,是否“否定缺点”的句子(“我从不迟到”),会比“肯定优点”(“我总是准时”)的,要来得更能测量到中国人的自我评价(杨中芳,赵志裕,1987)。

我又进一步追问,“自尊”两字对中国人而言,到底是什么意思?中国人的自尊,好像是要自己做到不让别人说自己不好、看不起自己才会有。这好像与西方的 self-esteem 所指涉的那种,自己看高、看重自己的概念,在意义上不完全相同。这让我质疑,中国人到底有没有相对于西方 self-esteem 这样的概念。看来,要研究中国人的自我,不单只需要一个自制的工具来测量中国人的自尊,还需要认真去反省,中国人日常用的概念背后的心理意义,是否与西方现有研究中的概念相吻合。

3. 中国人有没有自控

除了中国受试在研究情境的行为表现及自我评价之外,我也研究了为什么我们在控制源量表中,外控感知得分那么高这个问题。西方的控制源量表测量的是,个人总结其过去经验,认为自己的成败多是操纵在自己手上或在外在环境因素的程度。我寻思,在测量这样一个构念的研究工具上,中国人的外控感知得分高于西方人应该是无须争辩、想当然耳的,因为在中国社会中,即使没有高官、严法来管制,我们的亲戚、朋友也不会放过对我们的好意规劝及干涉。但是,测量或研究这样一个构念对理解中国人的自控到底意义大不大?是不是正如西方学者认为的那样,一个人外控感知高,就必然会放弃自控?

环视周遭的人,我觉得中国人虽然感到外控源的力量很强,但是大家还是在营营碌碌地,试图操纵他们的环境。的确,有人操控得比较多、比较好,也有人操控得比较少及比较不好。那么,那些操控得好的中国人,在这

些西方测控制源的量表上,是会有高内控的反应?还是会有高外控反应?即使是有高内控反应,他们与西方以相同量表所测出内控得高分的人相比,又是否用同样的方法在操控呢?这些问题显示仅用西方现有的构念及测量工具来研究中国人,好像是不足的。

再深入地去思索这个问题,我发现,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西方心理研究过分重视认知研究的传统,往往把“是什么”及“要不要做什么”混淆,以致以为“感知”控制源在外,就一定不会有“动机”去控制。有没有可能,由于在中国文化对天人关系的设想中,控制与被控的关系是互为消长的,因此在理解控制时,没有谁完全及永远控制谁的这种两分构念,不在于谁胜谁及谁支配谁的决定性问题。关键在于,如何能掌握及利用“长”时,避过“消”时。

将这一点放在人际交往的思考中,一个能自控的人显然是那些“能伸能屈”的人,而不是那些一味只求表现自己的人。如果中国人的控制观,果真是这样的,现有西方的控制源的构念及量表显然既不能捕捉到中国人这种“自我调控”的控制观,也不能测量中国人自控行动的个别差异。

这让我意识到,延续使用像西方控制源这样的一些高度抽象、放诸四海皆准的量表,对帮助我们理解中国人的自控行为,看来没什么太大用途。这里我们需要的显然是,另一个全新的、较具体的调控构念,及一个全新测量“自我调控”的工具,而非继续跟随西方研究那样,把重点放在“控制源”的研究上。而这些本土概念及工具,必须在对中国文化所内设的一些基本信念、世界观及意义系统有了充分了解之后才能出现。

4. 自我表现的探讨

另一方面,我也想,也许我们应该从外国文献中,找出那些能比较贴切地描述中国人的心理及行为的构念及工具来下手做研究。在浏览了西方的自我研究后,我发现有一个研究构念,用来描述中国人应该是最贴切的。那就是,自我监控这一构念。这个构念是指一个人在进入社会情境时,注意自己行为的适宜性,并调节自己的行为,去配合情境对自己的要求。既然这个构念的行为描述,与中国人的情况非常贴切,那用它来研究及理解中国人,应该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然而,当我用了 Snyder(1974)的自我监控量表来测量中国人时,所得到的因素分析结果,相当令我“失望”。它们与研究西方人的结果没有太

大差别,林以正(1985)较早在台湾所得到的结果也是如此。基本上出现了三个因素,其中有一个因素是:在不同的情境,表现一个不同自我的“自我变通性”因素。得到相同三因素的结果,本身并不令我特别惊讶,因为经过了对社会赞许、自尊,及自控研究的初步探索,我早已经发现,西方的这些研究工具所测量的构念,均是一些极端抽象、放诸四海不可能不准的东西,因此得到相同的因素,也算是意料中的事。

但是令我非常惊讶的是:在这个“自我变通性”的因素上得分高的人,竟然与西方结果一样地,也是那些自尊比较低、焦虑比较高,神经质得分亦高的人。我不禁纳闷:在中国文化的熏陶下,我们不是总鼓励“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吗?那么,为什么那些自认为是属于具有这种变通性的人,反而自尊不高,心理不健康呢?显然,一味地讨好别人,顺从情境,在中国这个文化中,也是让人及让自己感觉不好,心里不舒服的。

这样一来,这种因环境而应变的行为,要在什么情境下做出来,才是好的?在什么情境下做出来,就变成不好的呢?我猜测,这会不会与上述“自我调控”的能力有关呢?我们好像有必要在 Snyder 的构念及测量工具之上,更深一层、更具体地去探讨,中国人在进入一个社会情境时,注意些什么,考虑自我表现时要联想些什么,执行自我表现时要顾及些什么等。只有在对这些问题,有了初步的解答,我们才能真正的去理解中国人的调控。

5. 自发性自我的研究

为了要彻底了解中国人的自我,又为了要避免上述西方构念及测量工具可能带来的枷锁,我决定在另一个研究中,探讨中国人的自发性自我。所用的研究工具是,要受试回答二十个开放式有关“我是谁”的问卷。我想用之来发掘中国人自己脑海中所自然存有的、有关自我的东西。我收集了许多受试的资料,花了一整年的时间来分析,结果与张玉洁、胡志伟(1991)在台湾发表的结果近似,与美国的资料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不同。

本来,我以为注重社会规范及人际关系的中国人的自发性自我,内容应该包括更多有关角色的责任及义务,而对自身的特征,特别是心理特征(如个性、态度、性情等),应该没有重视到令它们会在自发性自我中涌现的地步。然而,结果却并不是这样的。中国人似乎有比美国人更集中意识于自己的心理特征的倾向。

6. 自我意识

西方自我研究中的另一个构念——“自我意识”，也曾吸引我想去看中国人在这方面，与西方人有什么不一样。西方学者对“自我意识”的研究，通常采取的是一个二分的架构，把行动者在行动中的自我意识分为集中在“私我”或“公我”这两种形态（Fenigstein, Scheier & Buss, 1975）。“私我意识”型是指将注意力集中于，自己在行动当时，内心的感受及想法的那种人。而“公我意识”型则是指，那些集中于自己当时，可能留给他人的形象的那种人。

我的经验告诉我，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一定比美国人更把注意力，集中于自己在公众场合所可能留给他人的形象上。如果我们用西方所研制的测量工具，来做一个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极有可能其结果也正是如此。再则，如果做文化内的比较，我们也同样会发现，那些公我意识强的人，是焦虑比较高，自尊比较低、比较爱面子、容易迎合别人的人。这个结果与西方的研究结果，恐怕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然而，我并没有再顺这个藤子爬上去，去把我的这些猜测付诸研究。因为，这时，我已明白了不少道理，整理出了不少规律，也发现了更大的问题，因而对这类文化比较的问题，已不再关心了。

我已发现，我如再以这些西方研究构念，来作为理解中国人的工具，我所得到的结果都会是一样的：除了些少的差异之外，中国人与西方人的研究结果都不会相差到哪里去。我已总结，我要不就得举起双手投降，接受“中国人、西方人都是人”的逻辑，放弃做本土研究。不然，就得停下来，好好想一想，为什么用这种方法，找不到我想要找的东西。这段时期所用的研究思路，显然已带我进入死巷。

二、要怎么研究

到这时为止，我对“自我”探索的结果，让我发现，我们在一开始把自己的研究结果之不能贴切地描述及理解中国人，完全归咎于使用外国工具时未作“本土化”，是一个太简单及幼稚的想法了。使用这些外国工具的问题，不只在它们不一定能测量到中国人的心理活动及其意义。更在

于,它们测量的是一些过分抽象的心理构念,完全抽离了具体内容,以致使文化根源的不同,成为末节、无关痛痒。

例如,自尊的构念,任何国家及文化的人,都有对自己看好、很满意的,也有对自己不看好、不满意的。在这么一个高的抽象层次上,没有文化差异是当然的。即使有文化差异,也无法知其所以然。工具的本土化,只能解决测量结果的文化可比性,却不会让我们在寻求那些抽象心理构念之相关背后,找到什么有意义的文化差异。真正要了解对自尊这一构念的文化内涵及差异,必须深入地去探讨一个文化里的人,以什么标准及怎么来判断自己是好,还是不好的。不要忙于用一些相当笼统的字眼,来概括一切的量表,来测量之,比较之。

这个结论,让我意识到,研究更深一层次的本土化,不在于研究工具,而在研究内容、研究构念及切入点的选择。西方研究中所提出的那些抽象研究构念,固然值得研究,但是在那个层次,即使我们将它们本土化,使它们贴切地测量了中国人,它们所能提供给我们的信息,还是空泛及有限的。而且,在做跨文化比较时,也必定不会找出什么了不得的差异。因为针对那么高的抽象层次的概念做研究,也就只能得到一些一般性的相关信息。

我们必须将我们的研究构念“降到”或“深入”到文化会造成差异的层次,才能真正研究到“中国人的心理”的“血”与“肉”。那么,我们要降低到什么层次,才能把文化的影响带出来?我们要在人的行为的哪一个具体层次,来研究中国人的自我才好呢?

除了这个问题之外,我不断地在寻求能贴切地描述中国人的构念的思路,也给我带来另一个困惑。就用前面所述的“自我意识”为例吧!如果中国人的“公我意识”比西方人强,那么用一个“公我意识”的量表来测量中国人,又有什么意思?它能告诉我们什么?文化间的差异不正是告诉我们,在自己的文化内,在这一维度上,是没有什么个别差异的吗?那么我们还用这些构念去看中国人的个别差异干吗?

这里,我注意到了研究目的及研究进路的不配合:我们要研究中国人的个别差异,却用了只能告诉我们个别差异最小的文化比较研究进路,来寻求能够最贴切地描述中国人的构念。这样一来,我不得不自问:我们非要用最能贴切地描述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之构念及工具,来研究中国人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要如何来看,在这些构念之上的个别差异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要如何把文化放到研究其中个体的

行为之上呢？我觉得这个问题一定要最先解决。

三、如何把文化放在自我的研究之中

经过几年的，像“无头苍蝇”一样地乱钻一顿之后，才发现“从什么地方开始？”“要怎么做？”这一类的问题，原来并不是这么容易回答。它们引发了更多、更根本、更重要的问题，必须先解决。其中，以“要如何把文化放在自我的研究之中？”及“要在人的行为的哪一个层次来研究中国人的自我才好？”这两个大问题，困扰了我很久。它们使我无心眷恋于发展研究中国人的测量工具，来做实证研究。因为，我当时认为，在没有把以上所关心的问题做一些澄清之前，我不知要发展什么样的工具，才能让我们更有意义地来研究中国人的自我。

我虽然收集及分析了大量的资料，但是总觉得并不满意，也不想把它们写出来。我觉得我自己的研究思路，一直受到自身训练的限制。虽然，我经常批评跨文化比较研究的贫乏性，但是，我发现我自己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长期以来，我不也是在西方人研究的框架底下打转吗？我虽不是在寻求中国人与西方人的不同处，然后再找一个我们文化的特点去解释这些不同，并从中预测新的不同。但是，我也是在西方研究构念及方法内，寻求比较能更贴切理解中国人的东西。

这种比较的做法，固然增加了我们对自己的了解（例如，他们是这样的，我们是那样的），也帮助我们看到了西方理论的不足（例如，他们的自控理论是自我驾驭，而我们是自我调控），因而看到在研究构念上有重新探讨的必要。但是，我已经感到，这种思路是“缘木求鱼”。如果持续用这种方法来理解中国人，我看到的会是什么？难道理解中国人，只是在于把中国人看成是中国人所独有、外国人所没有的吗？或者是，中国人与外国人的不同之处吗？

在对自己的研究做了深刻的反省及检讨之后，我再次肯定了我早期所提出，必须放弃采用跨文化的研究思路的观点（杨中芳，1987）。支持我的决定的理由有三点。第一，跨文化心理学一惯把文化差异简化为一个或两个文化特点。然后，把它们看成是自变量，再把另外一些不属于这一两个文化特点的一些行为，视为是随变量。在看这些自变量与随变量的线性关

系中,我们的基本假设是文化对其中个体的影响是“刻模”式的。亦即,有什么样的文化要求,就会“刻模”出什么样的个体行为。文化与个体行为的关系,是不是必然如此呢?

第二,跨文化研究经常以一个维度,不管是用“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也好,或是“独立自我/互赖自我”也好,来看文化间的差异。这种研究范式,有欠周全。因为,这些维度都是以不同的角度,在整理各文化内人们所显现于外的行为。对行为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却没法做深入探研。一旦把一个文化定为集体主义,那么研究者就好像觉得在那个文化中就再没有个人主义的人了,就没有不为集体而行动的时候了。这种视文化决定一切的角度,只能使我们把文化迷思化,也让我们自己的研究贫乏化。

事实上,在集体主义的社会中,我们看到人们也是各顾各地在生活着。而在个人主义的文化中,我们也会发现助人行为不遑多让。看来,我们必须把文化与其中生活的个体之行为分开来,不要等而视之。但是,却要找一框架把它们放在一起来研究(杨中芳,1994)。

最后一个促使我暂时弃用跨文化研究策略的原因是,使用这个策略的结果,容易助长进一步去探研超高于文化之上、有关文化与个体之间关系的、普及全人类的心理规律。因为西方心理学目前已有的研究构念,大多是那些高度抽象的构念,与他们做比较,必然必须把研究题材提升到那个层次。这样做,固然没有什么不好,我也不反对将来在对自己文化有了深层的认识之后,要与其他文化比较,以了解文化本身对人类行为之影响(这正是文化心理学的兴趣所在)。但是,这不是我现时所要的东西。

我现时更想要探索的是,有血有肉的中国人的“自我”,不是空洞贫乏的、普及全人类的“自我”!我想,如果我继续用我原有的思路来探索,我永远也无法对中国人的自我有一个更深层的理解。于是,我把那些研究资料放在一边,转而去寻求一个新的研究进路。要彻底理解中国人的自我,必须从零做起,先把自己的文化做一个全盘的整理,并努力寻求一个把文化与个体放在一起的研究架构。

在这个新的探索过程中,我发现在心理学的领域中,我是孤立无援的。为此,我只有求助于其他学科。我翻阅了人类学许多有关文化是什么的理论,选择了像D'Andrade(1984)等人的观点,不再把文化看成是行为本身,而把它看成是像语言一样的,是人们借以日常运作的工具。通过文化,人的行为才有了意义(杨中芳,1993)。它是人们相互沟通及理解的意义系

统,也是研究者要用之,来理解其研究对象的释义系统。

接着,我又在“人格心理学”有关如何把“人”放回人格研究之中的讨论里,去探求如何可以去研究人,而不是去研究特性或变量。然后,我又在早期文化人类学家有关国民性格、文化性格等研究的瀚海中浸泡,寻求他们试图联系“文化”与“个体”的模式。最终使文化心理学的兴起,让我感到非常兴奋,也带给我许多启发及灵感(杨中芳,1993)。

最终,我接纳了 Bruner(1990)强调人们具体行动之意义的观点,采取了 Cole(1989)、Jahoda(1992)及 Wertsch(1991)等人,将社会行为必须通过社会/文化/历史为中介才能互通的架构,来联系“文化”与“个体”(杨中芳,1994)。在这个架构中,文化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刻模”的。文化不是在塑造个体的行为,而是为个体运作日常生活提供一个工具。在同一个文化中的人,是用这套工具来进行沟通与交往,来支持他们的社会制度,来满足彼此自利或利他的行为本能。

以这样的架构来看文化及个体,我们不只是避开了那一连串,人们常向本土研究者诘问的问题:“人都是人,为何只研究中国人,难道中国人不吃饭,不睡觉吗?难道中国人与其他人之间没有共性吗?”而是迎刃而解了这些问题。是的,中国人是要吃饭的,吃饭是共性。但是,中国人要吃米饭才觉得饱,吃外国的“沙拉”,不但会拉肚子,而且感觉自己像吃草的牛,没有满足感。这些不是共性,但是这些才是我们要研究的,才是文化层次的问题。

四、在什么层次来研究中国人的自我才好

在决定用这样一个文化/个体关系的架构,来看一个文化中的人们,所表现的行为之后,下面还要决定的是,作为一个社会心理研究者,在什么行为层次上,这个以文化为中介的现象最能为研究者捕捉。所幸在西方“社会心理学危机”的争辩中,有一些内容带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当时西方社会心理学家的一个重要的抱怨是:由于过分强调实验法,社会心理学把“社会”给抽离了,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普及全人类的“个体”特征,如信念、推理过程、态度等。甚至,连“自我”这个较整体的“个体”构念,都被排除在一般社会心理学的范畴之外。更何况,认识到社会被